

《太平广记》中唐蕃交聘小说考*

刘林晓

(西藏民族学院文学院 陕西咸阳 712082)

摘要 在《太平广记》中有不少唐与吐蕃交往的小说。这些小说多以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作为故事的原型或背景。本文对其中涉及唐蕃交聘的小说进行考论,揭示其本事,考察唐代文人的史学意识和唐小说的史料价值。

关键词 太平广记 吐蕃 交聘 本事

中图分类号: I207.41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8388(2012)03-0121-04

唐蕃交聘是唐蕃关系史中极为重要的一个方面。使者的往来加强了政治、经济、文化多方面的联系,增进了相互了解。“自唐太宗贞观八年(634)至武宗会昌二年(842)的209年间,唐蕃使节交往共计290余次,其中蕃使180余次,唐使100余次。”^{[1](P150)}独孤及《勅与吐蕃赞普书》云:“金玉锦绣,问遗往来,道路相望,欢好不绝。”^{[2](P3930)}唐蕃交聘的频繁可见一斑。作为“小说渊薮”的《太平广记》所收录小说中有6篇涉及唐蕃交聘。笔者拟对其进行考论,以更好地了解唐蕃交聘的详细情况。

一、文成公主贡金

《太平广记》中的有关唐蕃交聘的记载始于贞观年间,其中卷一七一《李义琛》条涉及“文成公主贡金”事。原文如下:

太宗朝,文成公主自吐蕃贡金数百,至岐州遇盗。前后发使案问,无获贼者。太宗召诸御史目之,特命李义琛前曰:“卿神清俊拔,暂劳卿推逐,必当获贼。”琛受命,施以密计,数日尽获贼矣。太宗喜,

特加七阶,赐金二十两。(出《御史台记》)^{[3](P1254)}

《新唐书·李义琛传》中记载:

义琛擢进士第,历监察御史。贞观中,文成公主贡金,遇盗于岐州,主名不立。太宗召群御史至,目义琛曰:“是人神情爽拔,可使推捕。”义琛往,数日获贼。帝喜,为加七阶。^{[4](P4034)}

从贞观十五年(641年)文成公主入吐蕃到贞观二十三年(649年)太宗驾崩,史载吐蕃年年朝贡,且史书多有明确记载,如《册府元龟》卷九七九外臣部和亲二曰:“(开元)四年八月,吐蕃请和,从之。赏赐金城公主及赞普锦帛器物等,蕃酋皆喜,公主奉表谢恩曰……谨献金盞、羚羊衫段、青长毛毯各一,奉表以闻。”^{[5](P1500)}“(开元十八年十月),金城公主又别进金鸭盘盞新品物……请《毛诗》、《礼记》、《左传》各一部。”^{[5](P1502)}然此次“文成公主自吐蕃贡金数百”事史书记载较为模糊。

据《唐会要·监察御史》载:“贞观二年二月九日,御史大夫李乾祐奏加两员。以李义琛、韦务静为之。”^{[6](P1055)}由此可知李义琛贞观二年出任监察御史。据五代时期王定保《唐摭言》记载:“武德五年,

[收稿日期] 2011-10-26

[作者简介] 刘林晓(1984-)男,河南南阳人,现为西藏民族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古典文学文献学。

*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唐代涉蕃小说研究”(项目号:12YJA751070)项目和西藏自治区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太平广记》涉蕃小说研究”的前期成果。

李义琛与弟义琰、从弟上德,三人同举进士。义琛等陇西人,世居邛城。……琛位至刑部侍郎、雍州长史;义琰相高宗皇帝;上德,司门郎中。”^{[7](P73)}《新唐书》载为:“(李义琛)历监察御史,累迁刑部侍郎、雍州长史、黎州都督、终岐州刺史”。^{[4](P4034)}可见此人出身望族,身居显职,有其过人之处,他审理的贡金遇盗案也应所言非虚的。

唐太宗执政时期,唐蕃关系处于建立阶段,主要以修好为主,因此,双方往来也比较频繁。特别是贞观十五年文成公主出嫁吐蕃后,唐蕃间确立了翁婿和舅甥的名分,吐蕃赞普接受唐朝皇帝的册封,并行子婿之礼。这正是“戎王子婿宠,汉国舅家慈”^{[8](P942)}的蜜月时期。

二、员半千充吐蕃使

《太平广记》卷一六四《员半千》条讲员半千在廷中对策精明、睿智过人,高宗皇帝“奇之,充吐蕃使”:

高宗御武成殿,召举人,问天阵、地阵、人阵如何?半千曰:“师出以义,有若时雨,天阵也;兵在足食,且耕且战,地阵也;卒乘轻利,将帅和睦,人阵也。”上奇之,充吐蕃使。^{[3](P1192)}
《旧唐书·员半千传》:

寻又应岳牧举。高宗御武成殿,召诸州举人,亲问曰:“兵书所云天阵、地阵、人阵,各何谓也?”半千越次而进曰:“臣观载籍,此事多矣。或谓:天阵,星宿孤虚;地阵,山川向背;人阵,偏伍弥缝。以臣愚见,谓不然矣。夫师出以义,有若时雨,得天之时,此天阵也;兵在足食,且耕且战,得地之利,此地阵也;善用兵者,使三军之士,如父子兄弟,得人之和,此人阵也。三者去矣,其何以战!”高宗甚嗟赏之。及对策,擢为上第。垂拱中,累补左卫胄曹,仍充宣慰吐蕃使。及引辞,则天曰:“久闻卿名,谓是古人,不意乃在朝列。境外小事,不足烦卿,宜留待制也。”即日使入阁供奉。^{[9](P5015)}

《新唐书·员半千传》的记载与之相差不大。两传所载员半千武成殿廷试,及廷试题目对策都是有据可查的。不过,两传都没提及廷试后充任吐蕃使事,只是说“擢为上第”。从《旧唐书》中“仍充宣慰吐蕃使”一语来看,其在垂拱年间“入阁供奉”前就已经担任过吐蕃使了。

这一条属于《太平广记》名贤类,重在说明员半千过人的智慧和韬略。高宗皇帝面对员半千的

卓越表现“奇之,充吐蕃使”。说明了唐高宗对吐蕃问题的高度重视。可见,唐廷对如何处理与吐蕃的关系已经变得相当棘手。“吐蕃使”这个差事不是一般使臣可以充当的了,非大才奇才而不能为之。

松赞干布死后,吐蕃大论禄东赞掌握大权,唐蕃的亲密关系开始发生逆转。龙朔三年(663年),吐蕃占有吐谷浑,其北部直接与唐河陇相接,威胁着唐朝的河陇、西域。唐朝与吐蕃进入到了一个争战频繁的阶段。咸亨元年(670年),吐蕃大举进攻西域,“残羈縻十八州,率于阗取龟兹,拔换城,于是安西四镇并废”。^{[4](P6076)}是年四月,高宗派薛仁贵、阿史那道真等率军五万击吐蕃,在大非川与吐蕃钦陵(禄东赞之子)四十万军激战,唐军大败,全军覆没。大非川之役后,吐蕃乘势攻陷了安西都护府治所龟兹,占领安西四镇大都分治地。军事上失势,迫使唐废弃四镇,安西都护府治所迁回西州。唐对吐蕃的军事行动连连失利,唐廷对吐蕃关系的处理也进入一个疲于应付的时期。员半千的韬略满腹使唐高宗觉得其堪当大任,马上想到使其充吐蕃使。

垂拱年间,员半千“使吐蕃,将行,武后曰:‘久闻尔名,谓为古人,乃在朝邪!境外事不足行,宜留待制。’”员半千将出使又被武后“留待制”,原因为“境外事不足行”。垂拱年间,唐对吐蕃的形势已发生大的变化。《旧唐书·黑齿常之传》云:

(仪凤中)高宗叹其才略,擢授左武卫将军,兼检校左羽林军,赐金五百两、绢五百匹,仍充河源军副使。时吐蕃赞婆及素和贵等贼徒三万余屯于良非川。常之率精骑三千夜袭贼营,杀获二千级,获羊马数万,赞婆等单骑而遁。擢常之为大使,又赏物四百匹。常之以河源军正当贼冲,欲加兵镇守,恐有运转之费,遂远置烽戍七十余所,度开营田五千余顷,岁收五百余万石。开耀中,赞婆等屯于青海,常之率精兵一万骑袭破之,烧其粮贮而还。常之在军七年,吐蕃深畏惮之,不敢复为边患。^{[9](P3294)}

在黑齿常之的经营下,到垂拱年间,唐朝的河源防线更为牢固,成为抗御吐蕃的中坚力量。这大大减轻了朝廷的压力,故武后以“境外小事,不足烦卿”留之。

三、吐蕃遣使献宝函

《太平广记》卷二六《叶法善》条中有一段写唐玄宗时期“吐蕃遣使献宝函”之事。此函实为凶函,

欲以谋害玄宗,叶法善及时识破而救了玄宗皇帝。原文节录如下:

会吐蕃遣使进宝函封,曰:“请陛下自开,无令他人知机密。”朝廷默然,唯法善曰:“此是凶函,请陛下勿开,宜令蕃使自开。”玄宗从之。及令蕃使自开,函中弩发,中蕃使死,果如法善言。俄授银青光禄大夫鸿胪卿越国公景龙观主。^{[3](P170)}

此故事出自《集异记》及《仙传拾遗》。综合考察《叶法善》条中的故事多是荒诞不经的,“吐蕃遣使献宝函封”之事也于史无载。但故事作者安排这一情节还是有其历史背景的“合理内核”。

据文中“……迨后平韦后,立相王睿宗,玄宗承祚继统,师于上京,佐佑圣主。凡吉凶动静,必予奏闻。会吐蕃遣使进宝函封……”故事作者把此事安排于玄宗即位不久。又《旧唐书·叶法善传》云“先天二年,拜鸿胪卿,封越国公,仍依旧为道士,止于京师之景龙观”^{[9](P5108)}。《新唐书·叶法善传》也有相似的记载。据此可以确定故事所设置的时间背景是在玄宗初即位的先天年间。在此期间,吐蕃曾五次遣使入朝,分别为:

712年8月,蕃使来朝贡,玄宗宴于武德殿。12月,吐蕃两次遣使来朝。713年2月,吐蕃遣使朝贡,唐皇召见于门楼。7月,金城公主遣使来朝,告赞普祖母没祿氏丧。唐遣左清道率李敬摄宗正卿,持节入蕃会葬。^{[1](P154)}

这五次入朝,在时间和空间上提供了发生此类事件的条件。如果此事属于作者的虚构想象,那么把这个情节放在这个先天年间也是合乎情理的。景云元年(710年)正月,唐左骁卫大将军杨矩为使,御史大夫郑惟忠从行,送金城公主入蕃。唐蕃双方重归“舅甥姻好”。但就在此期间《册府元龟》卷九八零云:“玄宗开元元年(公元713年)十二月,吐蕃遣其大臣来求和,丁酉,命有司引吐蕃使宴于三殿。”^{[5](P11510)}从“求和”可以看出此段时间摩擦冲突、甚至兵戎相见的事仍然不可避免。《旧唐书·吐蕃传》云:

睿宗即位,摄监察御史李知古上言:“姚州诸蛮,先属吐蕃,请发兵击之。”遂令知古征剑南兵募往经略之。蛮酋傍名乃引吐蕃攻知古,杀之,仍断其尸以祭天。时张玄表为安西都护,又与吐蕃比境,互相攻掠,吐蕃内虽怨怒,外敦和好。时杨矩为鄯州都督,吐蕃遣使厚遗之,因请河西九曲之地以为金城公主汤沐之所,矩遂奏与之。^{[9](P5228)}

这条史料说明虽已和亲但双方仍在各自利

益的支配下做出一些与甥舅之礼不相称的举动。《新唐书·吐蕃传》也说此时“吐蕃外虽和而阴衔怒”^{[4](P6081)}。

综上所述,这个故事中吐蕃遣使献凶函事件有其发生的时空条件和合理的社会背景,故事虽系虚构,但故事作者把这个情节安排在这一时期有其可信的因素,反映了这一时期唐蕃关系的紧张局面。

四、李揆出使吐蕃

《太平广记》卷一五零定数五《裴谕》条和卷四九六《卢杞》条都涉及建中四年李揆出使吐蕃事。

《裴谕》条出自《前定录》,写了一个“善相人”给李揆算命极其灵验的故事,以此说明凡事皆有前定。这个故事自然是荒唐的,但其中所涉及的人物和事件都有史实依据的。故事中涉及李揆经历的部分为:

揆其年授右拾遗,累至宰相。后与时不叶,放逐南中二十年。除国子祭酒,充吐蕃会盟使。既将行而终。皆如其言。^{[3](P1081)}

卷四九六《卢杞》条出自《嘉话录》,谓:

卢杞为相,令李揆入蕃。揆对德宗曰:“臣不惮远,恐死于道路,不达君命。”帝恻然悯之,谓卢曰:“李揆莫老无?”杞曰:“和戎之使,且须谙练朝廷事,非揆不可。且使揆去,则君臣少于揆年者,不敢辞远使矣。”揆既至蕃,蕃长曰:“闻唐家有第一人李揆,公是否?”揆曰:“非也,他那李揆,争肯到此?”恐为拘留,以谩之也。揆门第一,文学第一,官职第一。揆致仕归东都,司徒杜佑罢淮海,入洛见之,言及第一之说。揆曰:“若道门户,门户有所自,承余裕也;官职遭遇耳。今形骸凋悴,看即下世,一切为空,何第一之有?”^{[3](P4069)}

这两则材料都记载李揆“充吐蕃会盟使”,《裴谕》条谓其“既将行而终”,而《卢杞》条则记载其曾到达吐蕃,并与蕃长有对话。因此,针对这两则记录,需要考证三个问题:第一,李揆晚年“充吐蕃会盟使”有无其事。第二,李揆的去世是在出使吐蕃前还是在出使吐蕃返回后。第三,李揆有没有与蕃长的那段对话。

《资治通鉴》卷二零云:

(兴元元年四月)左仆射李揆自吐蕃还,甲子,薨于凤州。^{[10](P7426)}

《新唐书·李揆传》的叙述更具体:

德宗幸山南,揆素为卢杞所恶,用为入蕃会盟使,拜尚书左仆射。揆辞老,恐死道路,不能达命,帝恻然。杞曰:“和戎者,当练朝廷事,非揆不可。异时年少揆者不敢辞。”揆至蕃,酋长曰:“闻唐有第一人李揆,公是否?”揆畏留,因给之曰:“彼李揆,安肯来邪?”还。卒凤州,年七十四,赠司空,谥曰恭。^{[4](P4808)}

通过以上的史料,可以确定:第一,李揆晚年确实为入蕃会盟使。第二,李揆是出使吐蕃返回到凤州后去世的。第三,卢杞与李揆的纠葛及李揆与蕃长的“唐有第一人”对话也是有的。因此,《裴谓》条“充吐蕃会盟使。既将行而终”之说是有误的,而《卢杞》则与史料相合。

李揆出使吐蕃是在唐德宗建中四年,清水会盟之后。唐德宗时期,藩镇割据的问题越来越严重,而且长期与吐蕃战争不利。唐德宗为了解决藩镇割据的问题,决定改对吐蕃的以战争为主的强硬政策为和平的怀柔政策。德宗建中元年(公元780年),唐朝首先派韦伦把吐蕃俘虏八百人送还吐蕃,与之议和,下令停止军事进攻,地方上的吐蕃俘虏也一律发给衣物遣回,并禁止他们充当奴隶,唐朝做出了很大的让步。终于在建中四年(783年)正月,唐蕃会盟于清水,订立清水盟约。据《资治通鉴》卷二二八记载,建中四年正月,陇右节度使张镒与吐蕃尚结赞盟于清水。七月,诸将相与区颊赞盟于京城之西。此次会盟之后,皇帝诏命左仆射、礼部尚书李揆为入蕃会盟使,礼部侍郎班宏为副使,并送区颊赞回吐蕃。李揆到了吐蕃之后便有了酋长和李揆那段“三个第一”的对话。

从《太平广记》中记载的“李揆出使吐蕃”事中可以读出丰富的内涵:第一,由酋长和李揆的对话中涉及“唐家第一人”可知吐蕃对唐真所谓巨细毕知,非仅注意其官职,亦同时注意其门户与文学,充分说明当时唐蕃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达到相当高的水平。第二,唐朝官吏把“入蕃”视为畏途,李揆当时为宰相卢杞所忌,竭力排挤,才使李揆有了“入蕃会盟使”之职。并说:“……且使揆去,则君臣少于揆年者,不敢辞远使矣。”第三,从“揆畏留,因给之曰:‘彼李揆,安肯来邪?’还。”一句说明李揆惧怕被留吐蕃而欺骗了酋长。吐蕃扣留唐朝使者在当时是比较常见的,如《资治通鉴》卷二二五大历九年条记载:“谏议大夫吴损使吐蕃,留之累年,竟病死虏中。”^{[10](P7225)}《册府元龟》卷六六二记载:“吕温为左拾遗,贞元二十年,副工部侍郎张

荐为入吐蕃使。吐蕃以中国(意指唐朝——作者注)丧乱,留温经年。”^{[5](P7928)}《册府元龟》卷六六一记载(永隆二年),唐朝吉州长史陈行焉出使吐蕃,“因被拘留十余年而卒”^{[5](P7912)}。吐蕃仰慕唐朝文明,对于入蕃汉人有一定才能的都想留下来为己所用。李揆的名气很大,远播周边民族地区,也更害怕自己被吐蕃留下来,故给之。

五、张荐入蕃吊祭

《太平广记》卷四九七《张荐》条出自《传载》。文为:

张荐自筮仕至秘书监,常带使职,三入蕃,殁于赤岭。^{[3](P4077)}

此故事是说张荐本人“自筮”而得知自己的前程,本身是荒诞的。但据《旧唐书》卷一四九《张荐传》所载:

(贞元)四年,回纥和亲,以检校右仆射、刑部尚书关播充使,送咸安公主入蕃,以荐为判官,转殿中侍御史……延龄排摈不已,会差使册回纥毗伽怀信可汗及吊祭,乃命荐兼御史中丞,入回纥。二十年,吐蕃赞普死,以荐为工部侍郎、兼御史大夫,充入吐蕃吊祭使。涉蕃界二千余里,至赤岭东被病,殁于纥壁驿,吐蕃传其柩以归。^{[9](P4024)}

所谓张荐“三入蕃”,前两次是出使回纥,第三次才是出使吐蕃。

张荐充任的是“入吐蕃吊祭使”。在唐蕃交聘中,双方的君主、皇后、皇太后崩薨都要遣使向对方告哀,然后对方遣使吊慰,就是吊慰使,也称吊祭使。这在史料中有很多记载,如“永徽元年五月,宝王吐蕃赞府薨,帝举哀于光化门,遣右武侯将军鲜于济赉玺书往吊祭之。”^{[5](P11443)}“(调露元年二月)癸亥,吐蕃文成公主遣其大臣论塞调傍来告丧,并请和亲,上遣郎将宋令文诣吐蕃会赞普之葬”^{[10](P6393)}等。张荐这次吊祭的是牟尼赞普,除派使者吊祭外,德宗还为之废朝三日,以示哀悼。由此可见,唐蕃双方虽然多次发生战争,和平友好相处还是占主流的。

从对以上《太平广记》中关于唐蕃交聘的六条材料的考论可知,这些小说材料中所包含的唐蕃交聘内容都大多是有案可稽,与正史保持着高度的一致性。即使有些材料披上虚构的外衣,我们也

(下转 132 页)

标。从这个角度来看“传神达意”更像是对译者的要求,或者是译者的追求,不是理论家批评的标准,这正是“传神达意”最根本的价值所在,而作为典籍英译的标准还需要进一步丰富和完善后并运用到实际的翻译批评之中。

四、结 语

“传神达意”继承了中国传统译论的致思方式,从翻译本体出发来探讨翻译的原则或标准问题,带有明显的中国特色,属于中国传统译论的范畴,缺少理论上的系统性是其弱点,故而不能形成理论上的增长点。而外国的翻译理论也遭受到了相同的命运,自上世纪 80 年代后,我们从国外舶来了不少新的翻译理论,未能很好地与本土的理论结合起来,可惜都短命地夭折了。在如何兼顾二者,做好转换方面,南开大学王宏印教授做出了很大贡献,他在《中国传统译论经典诠释——从道安到傅雷》中提到了中西译论的互相阐发的具体策略,“以西方现代译学和哲学的框架为参照框架,对于中国传统译论中的相关问题进行清理,从中寻找相关论题,加以理论阐释,加以条理化和明晰化,以便形成和国际译界对话的资格”^[2](P240)]。在此国际视野的观照下,香港张佩瑶教授主编了《中国

翻译话语英译选集》^[8],目的就是与国外的译界形成对话,但仅仅是翻译还是不够的,还需要整理和阐释,这也是我们要做的事,即从理论上对“传神达意”进行全方位的“包装”,使其形成独特的典籍英译的理论,并能够融入到国际译论的大环境中去,充分体现中国传统译论的本体性和实用性。

[参考文献]

- [1]葛兆光.中国思想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
- [2]王宏印.中国传统译论经典诠释——从道安到傅雷[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
- [3]李才远.欧阳健的朴素唯物主义认识论[J].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79(3).
- [4]张玲.传神达意,“译”味隽永——汪榕培英译《枫桥夜泊》的艺术[J].中国外语,2010(1).
- [5]罗新璋.翻译论集[C].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 [6]王铁钧.中国佛典翻译史稿[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
- [7]汪榕培、王宏.中国典籍英译[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9.
- [8]张佩瑶.从软实力的角度自我剖析《中国翻译话语英译选集(上):从最早期到佛典翻译》的选、译、评、注[J].中国翻译,2007(6).

[责任编辑 高全孝]

[校 对 夏 阳]

(上接 124 页)

可以从中探寻出其合理的真实内核,表现了小说家在进行创作时那种浓重的史学意识和社会历史责任感,力求再现唐蕃在长期交往中的真实历史场景。

[参考文献]

- [1]谭立人,周原孙.唐蕃交聘表[J].中国藏学,1990(2、3).
- [2][清]董诰等.全唐文[M].北京:中华书局,1983.
- [3][宋]李昉.太平广记[M].北京:中华书局,1961.

- [4][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 [5][宋]王钦若等.册府元龟[M].北京:中华书局,1960.
- [6][宋]王溥.唐会要[M].北京:中华书局,1985.
- [7][五代]王定保.唐摭言[M].北京:中华书局,1959.
- [8][清]彭定求等.全唐诗[M].北京:中华书局,1960.
- [9][后晋]刘昫等.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 [10][宋]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56.

[责任编辑 袁书会]

[校 对 夏 阳]